

于右任新闻思想浅议

阳海洪,严远丹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他的新闻思想具体包括:报纸兼具革命喉舌与民众喉舌的双重功能观,首重社评的言论观,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观。在新闻业务方面,于右任认为报纸要重视记者队伍的建设、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要有丰富多样的专栏形式。

[关键词] 于右任;办报活动;新闻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5)01-0114-05

On the News Thought of YU Youren

YANG Haihong, YAN Yuandan

(School of News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Yu Youren, who i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t; formed his news ideas and specific contents, such as: the newspaper have dual function of both the public view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uthpiece,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editorial remarks, focusing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of news talents. In the news business, Yu Youren think newspap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team of reporters, translators and international news attention to foreign reports, the emphasis on economic attributes newspaper columns have a rich and varied forms.

Key words: YU Youren; newspaper events; news ideas

于右任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从1907年至1911年,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份报纸。期间或坐牢,或流亡,或遭灾祸,但仍素志不改,愈挫愈奋,不遗余力鼓吹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与反帝反封建报纸的先驱。在办报实践中,于右任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于氏的新闻思想,既深受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又有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烙印,但于作为革命党人,办报是为了革命需要,革命需要传媒来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

一 “双重喉舌”的媒介功能观

作为革命党人,于右任对传媒的思考带有相当

功利性,传媒功能成为他关注传媒、思考传媒的出发点。

(一) 报纸是革命的喉舌

于右任在办报过程中,屡遭磨难,但他办报素志不改,原因在于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看到了舆论鼓吹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今日救国之责任,报馆分十之六”,^{[1]238}革命党人应该积极办报,将报纸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以为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为革命服务。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于右任指出,报纸具有巨大的传播功能,能传播政治家的滔滔雄辩,阐述革命志士的救国理论,凝聚国魂,焕发群众的集体意识,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为社会秩序树立价值典范。与一个人仰天独叹,忧心不已相比,“厥用益宏。”^{[1]13-14}革命者可以利用大众媒介,传播革命声音,唤醒民众投身革命运动,推动社

收稿日期: 2014-06-19

作者简介: 阳海洪(1969-)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与影视批评;严远丹(1991-)女,湖南耒阳人,湖南工业大学2010级学生。

会改革。同时,革命党还能利用传媒,揭露清政府的专制黑暗。清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剥夺民众权利,是“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在这样的黑暗统治下,民众难有活路,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的满清政府。“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何也?制造革命党也。”^{[1]214} 革命党是腐败政府制造出来的,是官逼民反的结果,革命是民族救国的惟一之途。正因为于右任对报纸的革命喉舌功能有着清晰的体认,在办报实践中充分践行了自己的主张,极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学说,报道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树立革命必胜,清廷必败的信心,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舆论功能。辛亥功成之后,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武昌起义,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响应,清祚以亡。则两报(《神州日报》和《民立报》——引者注)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2]

(二)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

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革命阶级“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3] 因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喉舌的于右任,同时也提出了报纸必须成为民众的喉舌,“代表民意”“宣达民情”“鼓舞民气”,以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准备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将“革命的喉舌”和“民众喉舌”有机结合起来,认为报纸具有“为革命作舆论的先导,为人民的喉舌”这种双重的喉舌作用,^[4] 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

于右任从他的资产阶级民权观念出发,认为报纸应当代表民意,做人民的代言人。他在阐述自己创办《民呼日报》宗旨的启事中指出,“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1]18} 报纸当以“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以民众的需要、喜好、憎恶作为取材标准,反映民众意见,表达民众呼声,“痛陈民生疾苦”,维护民众的利益诉求,“使吾民之义声、爱声相接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1]36} 这样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于

右任从小生活在农村,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深刻了解,对清吏腐败十分痛恨,因而反映民间疾苦和宣达民情成了他办报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于右任认为,舆论是民主政治的运作基础。报纸作为民众喉舌,其重要职能就在于能监督政府。通过中西对比,于右任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专制统治造成“上下之情睽”“呼泣之声阻”,缺少渠道沟通上下,发抒民众的意见,因而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而在西方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中,赖“报纸之力”甚大,因为报纸的新闻报道记载详实,能将政府之真实情况公之于天下,使政府官员无所遁形。同时,报纸还是一个公共空间,“褒贬众著”,^{[1]30} 民众可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监督政府的运行。因此,监督政府是传媒的重要功能。《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报纸“以其性质监督人,而非为人所监督”。为防止“民上者”为所欲为,必须进行舆论监督,“以巩人民之藩篱,使官吏无所施其伎俩”。^[5] 缺少民众监督的“民上者”往往罔顾民众利益,贪图一己之私,侵害民众利益。“可知有鬼混之政府,则产魔鬼之御史,不幸遇见捉鬼之乡亲,又遇见打鬼之新闻记者。”^{[1]89} 民众必须充分利用传媒“打鬼”“捉鬼”,使政府尊重民意,切实维护民众利益,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

二 “首重社评”的报刊言论观

于右任极为重视言论在报刊中的地位,认为报纸应“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1]36} 他在陈述自己的办报经验时说,自己以一穷书生历办各报,所以有幸而成者,实赖同志之帮助,而报纸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尤为各报社评见重于世之原因”。这是诚心之论,于右任本人即以社评见长,而在他的编辑部里,更是集一时人才之盛,组成了强大的笔阵,这是于右任所办各报成功的重要原因。

1. 独立性。追求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使命。在于右任看来,独立言论与独立民族密切相关。有独立之言论,才有独立之人格,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民族。故欲求民族之独立,当求独立之言论;欲求独立之言论,当求独立之民族。“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1]36} 在于右任看来,媒介是民众最好的老师,独立的言论方能培养

国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精神,所以媒体在品藻人物,指摘时事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正原则。“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媒体的责任。“故社会中有真是非,而后能产出真人物。”^{[1]72}如此方能组成独立之民族,建立独立之国家。因此,报纸之言论,要阐发圣哲先贤自由自立思想,以培养国民的自立精神;要褒扬历史上民族英雄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之事迹,以培植国民独立之思想。在这里,于右任一方面希望革命党人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唤起民众,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资产阶级革命早日成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保障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真正自由地代表本阶级说话。^[6]

2. 公正性。针对当时报纸明哲保身而不敢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失去了客观公正精神的现状,于右任非常痛恨。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新闻界“传播谣言”“铺张琐闻”“党同伐异”和“私而忘公”的种种流弊,对“做达官之机关”与“为他人之奴隶”的报纸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办报者立言建议,当以公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伸张正义,不能带有媒体之偏见,亦不能利用媒体为自己谋私利,“舆论所是者则是之,舆论所非者则非之,”^{[1]20}曾有读者来函指责《民立报》立言太刻,于右任回函道:“我贡直言于国民,国民谅我无他,则他不计也。我贡直言于同胞,则外人之对我如何,我更不计也。”^{[1]94}正是抱着这种“只认公理”的言论态度,“宁为牢中之囚犯,不作诬善隐恶之记者”,^{[1]30}于右任所创办的报纸才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与尊重。

3. 建设性。辛亥革命之前,于右任昌言革命,持论激烈。辛亥革命后,言论偏向平和,结果遭到党内偏激派的批评,指责《民立报》不骂袁世凯是改变了办报宗旨。对此批评,于右任指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言论方针是不一样的,革命前骂满是一种策略,革命后当以建设性态度从事言论工作。针对民国之后互相攻讦的政坛乱局,于右任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国家、民族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于右任认为,在报纸上展开辩论是应该的,但这种辩论必须效法英国的《泰晤士报》,持建设性态度,“不作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1]237}由激进之论转向建设之言:“是以本报对目下政局之态度,当纠正处,则纠正;当策励处,则策励。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任。”^{[1]237}媒体要做政府之诤友,立言时应为国家利益着想,为政府利益着想,不能以偏激之论沽名钓

誉,影响政府行政,损害政府权威。

三 “德才兼重”的新闻人才观

在于右任看来,“新闻记者之荒废职务,误国误民,其最更甚于劣等官吏。”^{[1]85}故新闻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新闻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呢?对此,于右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在《民呼日报》上刊载了自己办报的十要素:“一曰志。志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二曰仁。忧人忧己,苟利人则为之”;“三曰义。急人之急,善善而恶恶,如江河之决,不可终日”;“四曰智。社会有不善未尝不知,自元恶大憝,细奸私匿,视之如烛照而数计也”;“五曰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刃可蹈,而口不可关”;“六曰公。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直切言其得失,无所偏袒”;“七曰洁。誉之者非其有恩于我,毁之者非其有怨于我,嚼然尽力于社会,而不希丝忽之报”;“八曰忠信。其志所在,始终如一,忠于社会,忠于国家,永不背叛”;“九曰讽喻。有直言者,有委屈以言之者,故惟选诗歌小说之文,多其方以诱导社会”;“十曰财力。必有充分之金钱,足以供调查社会种种之事实,及预备讨论、文学之材料”。^[7]在这里,十要素既体现了于右任对自己在新闻业上的要求,又从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他在新闻人才观方面的思想,他主要是从“德”与“才”两个方面对新闻人才提出要求的。

1. 品格优先。十要素中,“志”、“仁”、“义”、“勇”、“公”、“洁”、“忠信”等诸要素,主要是对新闻记者的道德要求。记者要有同菩萨心肠与仁义情怀,手中之笔要忠于国家和人民,持论公心,不以报纸做交易,谋私利,要品行高洁。简言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1]38}记者只有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切实树立为国为民的办报志向,方能符合职业要求。在于右任的新闻生涯中,虽屡次抨击权要,讥讽时政,但因持论公正,赢得了读者信赖与支持。在他的报人生涯中,他经历了坐牢、通缉,甚至遭到像孔子一样“在陈绝粮”的处境,好友在爱莫能助下为他当街抢饼。在这样危险的处境下,他依然坚持素志,而在此之前,即他退出《神州日报》后,上海道台蔡乃煌试图用重金收买笼络他,如果当时他接受笼络,成为“食下客”,或许就能免遭这样的困境,但是他毅然选择了拒绝,以他的身体力行很好地诠释了一名记者所应当有的道德操守。

2. 亦重才学。在十要素中,“曰智”,即记者要通晓天下之事,做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做照亮黑

暗的明烛。记者立言记事,要有文学技巧,要注意时间场合。这是从才学方面对记者进行要求。于右任在阐述自己的办报经过时说,“担任写社评的必须是第一流的作家”,因为“没有丰富的知识,不但写不出好的社评,也不会做出伟大事业来。因此,希望大家在这点上,尽量的做工夫,我们要有丰富的外国知识,但我们更需要丰富的中国知识,这是我多年的经验,也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至理。”^{[1]262}报纸是时代进步的晴雨表,记者只有加强自己的学习,方能与时俱进。“报馆立言,当有时代,此中作用全在新闻记者之识力、学力。”^{[1]241}这说明于右任非常重视记者的才学修养,作为一名出色的记者,既要有文字功底,也应当是某一领域的专才或专家。

四 于右任的新闻业务思想

考察于右任的办报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在新闻业务上,于右任也多改进之处,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1. 重视记者队伍建设。在于右任的编辑部中,人才荟萃,宋教仁、陈其美、徐血儿、吕志伊、张季鸾、叶楚伦、马君武、章士钊等,均系同盟会和南社的中坚人物,这与他善于网罗人才、重视人才息息相关。同时,他认为在记者队伍的建设中,应当注意其人才结构的完整性,认为记者当中要有“长于小学,熟谙国史”的人,要有“精研名理,兼通佛乘”的人,要有“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要有“精研舆地,熟于国际形胜”的人。于右任指出,他办报的时候,“海内作家,声应气求,翩然来会”,“人材亦一时称盛,各有专长”,故报纸之成功,“实由同志帮助之功。”^{[1]260}

2. 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于右任在《民立报》发刊时指出,《民立报》“重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实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1]36}非常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电译文,登载独多”。^[8]创办《民立报》时,尽管当时电报费用不菲,他却不惜重金。“有一次电报局信差送来一批欧洲发来的新闻电,一算电报费用要大洋600元。从当时报馆的经济情况而论,无法偿付这笔巨款,但不付钱就拿不到电报,只好动员全报馆每个人的力量,多方设法筹措,才勉强付款。”^[9]由于《民立报》在外电翻译方面不惜代价,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还向《民立报》购买国际新闻电稿。在重视国际新闻报道方面,于右任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拓宽新闻渠道来源,在日本、英国、法国等国聘请通

讯员,能方便及时地采发国际新闻;二是他不为成见所囿,重视“列强敌国”的信息采集,加强了对“日本”等国家的新闻报道工作,这点尤为难能可贵。如在东京他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担任通讯员,对日本的新闻进行采集和翻译日报的工作。

3. 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于右任是同盟会员,其所创办的报纸,是革命党的机关报,但他在办报过程中,非常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他以股份制形式筹措资金,却不接受官股和外股,党报却以“社会事业”和“股份公司”的面目出现,显示出于右任对现代报业的理解与认识。重视报纸广告和发行工作,采取多种形式招揽广告和提高报纸发行量。在报纸上辟有各种商务专栏,逐日编发“本埠各行物价表”,加强经济方面的信息传播。在于右任的报纸上,上海地区有关金融、贸易、货运、税收和企业事业开关闭停动态得到了详细报道,介绍国内外有关经济商务的发展情况,发表有关国内工业发展及兴办铁路的评论,由此可以看到他对经济信息和报道的高度重视。

4. 丰富多样的专栏形式。社评是报纸的重要内容。于右任所主持的四份报纸,社评能“紧密配合革命形势,为革命党张目摇旗”。^[10]同时,社评的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短评,也有时评,多以针对当时的时局发表评论,有时甚至采用编者按的做法,以引起读者对报道内容的关注。开辟了各种评论专栏,如设有诗文评论专栏,刊发大量诗文,于右任本人也经常为报纸写诗立文,如他创作的《元宝歌》,以此来揭露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无能,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设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剧专栏,还有各种商务专栏评论,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借助诗歌、图画辅之以评论。于右任认为,在特定的形势下,某些言论不能直切表达,这时运用传统的诗文讽喻手法,普通民众更能心领神会,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此外,他还在报上特别开辟画页专栏,“画身以讽刺画与小说画为主”,较之以赤裸的铺陈直叙,它更为生动、精彩、富有特色。

在于右任的生命历程中,他办报的时间并不长,从1907年创办《神州日报》始,到1913年因《民立报》停刊离开报业,前后约7年,却是于右任一生中最难忘也最使人怀念的岁月。于右任以报人和党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报坛上。其时人心思变,革命思潮涌动于中华大地,于右任以他的激扬蹈厉的文字,鼓吹反满革命思想,为其赢得了“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盛名。寻其原因,在主办者的主观原因之外,或许客观的时代因

素更值得我们注意。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新闻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清道夫,其根本任务就在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新闻”的骨子里,永远都保持着对现存秩序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理想主义精神。因此,在革命时代,革命家往往充分利用传媒的激进姿态,挑动底层民众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情绪,以赢得民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以为革命奠定群众基础和道义合法性。于右任能以一支笔摇动那个时代,正是新闻人和革命家的蜜月时期。革命助传媒以烈火,传媒助革命以狂风,报纸一纸风行,革命遂成星火燎原之势。但在革命之后,革命与文艺之间的同一性就丧失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明确,革命家的目的就在于夺权,权力到手,大功告成。此时革命者成了新贵,是新政权的统治者。文艺家和革命家的蜜月期即告结束;革命文艺家与革命家从此就分道扬镳了。今后的使命是“政治思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二者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所以,政治家要求文艺家维持现存秩序——“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或是割掉他们的头。”革命成功后掌权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他们看来,传媒的功能在于它是统治者行使教化的工具,能为政府营造舆论支持。政府扶持与保护传媒,其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经由各种手段和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特定指向的政治社会化,目的是通过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而使特定的政治意识内化为其公民的自觉的行为规范,从而营造出一种适合于维系和巩固其自身统治的政治文化。

民国建立之后,于右任在《答某君书》中,就敏锐地发现了新闻与革命的时代关系。他指出,以前在革命时代大骂满清政府的言论只是一种策略,革命时代当以破坏自任,但在建设时代,当以建设自任。因此,“报馆立言,当有时代,此中作用全在新闻记者之识力、学力。当放开时放开,当收束时收束,不迎合社会不可,不策进社会不可,不矫正社会亦不可。”^{[1]241}在革命时代,是放开的时代,是迎合

群众的时代,是革命家和新闻人携手共进的时代;而在革命后的时代,则是“收束”群众的时代,是“矫正”群众的时代,是革命家和记者开始分道扬镳的时代。民国之后,于右任离开记者岗位,开始从政生涯,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这个职位与于右任曾经鼓吹过的传媒应该监督政府很相匹配,但于却鲜有建树,而是以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的身份成为国民政府的点缀与花瓶。在革命时代高唱“自由”“民主”痛斥清政府专制黑暗的国民党开始努力重建其“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那些老法子——禁邮、闭馆、逮捕报人、暗杀——重新采用起来,历史旧剧重新上演。民元之后,政党为了各自之私利而勾心斗角,利用报纸互相攻讦与倾轧,目睹此种情状,于右任痛心疾首:“报纸乎?政党乎?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吾为中华民国哭!吾为中华民国哭!”^{[1]241}这句话里,为我们讲述了在“革命”“人民”等宏大话语遮蔽之下的历史秘密:革命并没有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新东西。

参考文献:

- [1] 傅德华. 于右任辛亥文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 [2] 冯自由. 革命逸史: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14-31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
- [4] 杨荣,王劲. 试论于右任的新闻实践及新闻思想[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2):76-81.
- [5] 马鸿谟. 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1909.5-1910.12[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5.
- [6] 王保平. 于右任新闻思想探析.[J]. 新闻知识,1994(1):43-46.
- [7] 屈新儒. 于右任别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4.
- [8] 许有成,徐晓彬. 于右任传[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68.
- [9] 陆诒. 访于右任办报[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5):39-44.
- [10] 袁春乾. 论于右任在新闻史上的地位[J]. 新闻知识,2004(12):21-24.

责任编辑:李珂